

生物、文化多样性保护与 社区发展协作模式及机制研究 ——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为例

SHENGWU WENHUA DUOYANGXING BAOHU YU
SHEQU FAZHAN XIEZUO MOSHI JI JIZHI YANJIU

王 昕 母泽亮 续 嵩 武 光 著



科学出版社

资助: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9XMZ036),重庆市地理学重点学科,重庆市资源环境与生态建设创新团队,重庆师范大学旅游职教协同创新中心

生物、文化多样性保护与社区发展 协作模式及机制研究

——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为例

王 昕 母泽亮 续 嵩 武 光 著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可持续发展、生态资本、社区主义和利益相关者等相关理论为指导,通过文献分析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将问卷调查与典型调研相结合、区域经济状况动静相结合,分析了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生物—文化多样性与社区发展的现状与特征,识别了该类区域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焦点与相互关系,提出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生物—文化多样性和社区发展的系列协作模式和协作机制,为持续维护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优质生态系统和优秀文化系统提供了基本情况,为实现该类区域生物—文化多样性相互促进,推动区域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文化系统的传承与发展,拓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思路,推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了参考与借鉴。

本书可作为我国多民族地区高校相关专业的高年级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作为相关专业科研人员、高校教师和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参考读物。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物、文化多样性保护与社区发展协作模式及机制研究: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为例 / 王昕等著—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2

ISBN 978-7-03-047147-5

I. ①生… II. ①王… III. 少数民族—民族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西南地区 ②少数民族—民族地区—民族文化—多样性—保护—西南地区 ③少数民族—民族地区—社区管理—研究—西南地区 IV. ①Q16 ②G127.7 ③D66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17340 号

责任编辑:杨 岭 韩雨舟/责任校对:冯 铂

责任印制:余少力/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成都创新包装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6 年 2 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16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9.5

字数:200 000

定价:4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前 言

自 1972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成立,《我们共同的未来》(1987)、《生物多样性公约》(1992) 等一系列国际公约表明,生物多样性保护已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广泛的认同。2010 年公布的《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第三版)认为,2002 年世界各国领导人共同设定的“到 2010 年实现大幅降低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速度”的目标没有实现;造成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压力不仅继续存在,某些情况下还在加剧。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公布研究报告(2010)也指出,当下物种消失率是自然死亡率的 1000 倍!

早在 1966 年,国际组织就缔结了《国际文化合作宣言》。文化多样性问题开始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1988 年《贝伦宣言》在全球范围内倡议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之间的统一性。1996 年“濒危的语言、知识和环境”研讨会则首次在国际性跨学科合作上强调了保护“生物—文化”圈的紧迫性。随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97)、《关于保护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建议》(1989)、《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01)、《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等国际公约相继公布。2003 年联合国出版《分享一个多元的世界:全球语言、文化和生物多样性》,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隆重推出“生物—文化多样性”一词,标志着该概念成为全球共识、全球通识和行动准则。200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

近百年来西方世界社区、社区组织、社区发展在诸如贫穷、疾病、失业、经济发展等社会问题的解决上所积累的经验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1951 年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通过 390D 号议案,建立“社区福利中心”。不久“社区福利中心计划”也更名为“社区发展计划”。1954 年联合国改组社区组织与发展小组,建立了联合国社会事务局社

区发展组，致力于将社区发展运动积极推动到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

中国在生物多样性排名上位列全球第 8 位。自缔约《生物多样性公约》以来，中国先后发布四次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国家报告，并于 1994 年制定《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截至 2010 年，尽管该计划所列的七大目标和 26 项优先行动已基本实现和完成，法律体系初步建立、工作机制逐步完善、就地和迁地保护工作成绩显著、生物安全管理得到加强，但于 2010 年制定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仍明确指出，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仍面临生态系统功能不断退化、物种濒危程度加剧和遗传资源不断丧失和流失等严肃问题。在文化多样性保护与传承方面，截至 2014 年，中国已经公布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录，涉及民间文学、传统舞蹈、曲艺、传统美术、传统医药、传统音乐、传统戏剧、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技艺和民俗十大类共计 1517 项、2046 人。尽管如此，中国在文化多样性保护与发展上仍面临着传承人老龄化等严峻形势和考验。同时，中国社区在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领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积累的经验还十分有限。总体来看，中国在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及社区发展方面的实践和研究有待进一步充实。

本研究以西南地区的渝、川、滇、贵、藏五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对象。其中，该区域内的青藏高原高寒区和西南高山峡谷区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中确定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在区域上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本研究将“少数民族地区”界定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域”。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共计 28 种，约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数的 52.83%；其中贵州未识别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未识别少数民族总数的 97.8%；截至 2011 年，区域内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近 200 人，占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总数近半数，且突出地反映了男女失衡、老龄化的全国性特征，在人口统计学上也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西南少数民族的多种族性是该区域文化多样性的基础。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来看，西南地区不但占有全国 1/4 强的项目，而且还在传统舞蹈（57.7%）、传统医药（42.9%）、传统技艺（32.5%）上占有重要地位，在文化多样性种类和数量上表现出典型性和代表性。

本研究认为，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为样本，研究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和社区协作模式与机制具有以下现实意义：

- （1）通过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持续维护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优质生态系统；
- （2）通过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持续维系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优秀文化系统；
- （3）通过社区发展，持续推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协同发展；
- （4）通过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相互促进，推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系统的

可持续发展与文化系统的传承与发展,从而实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发展;

(5) 通过探索基于社区的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协作模式与协作机制,拓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思路,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收入水平,建立良好的社区结构和友好关系、培养和发展社区民居的民主意识和自治互助能力,不断提高社区伦理道德、生活文化水平。

本研究整合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利益相关者、公民资格、社区主义、公共物品、需求理论、生态资本、生态补偿和生命周期等理论,通过社会对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保护与开发的认知态度的网络调查,以及渝黔滇川的典型调研,分析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多样性资源保护与开发现状,掌握了利益相关者对多样性资源的认知现状,了解了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分析了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关系,深刻认识到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保护问题的严峻性和紧迫性。针对该区域多样性丰富,但保护和传承问题突出、二元经济结构典型、政府职能缺位、相关利益主体多样性认知与意识不全面、权与利及分配机制不完善等突出问题,核心建议如下。

第一,提出以生态博物馆为主要内容的自然协作保护模式。

第二,提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协作保护模式,具体包括涵盖保护体系、保障体系和发展体系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综合模式;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为主要内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专项模式;以民间舞蹈的保护与开发、民间刺绣的保护与开发为例的个体性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模式;通过提高西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水平、建立数字化图书馆、博物馆等途径的文化遗产库模式。

第三,提出包括三阶段八步骤实施流程的社区协作模式、三阶段六步骤的社区共赢模式、以生物资源主导和文化资源主导为主要形式的社区共生模式;并从适用性、理念依据、形式和内容、组织形式、资源保护途径、决策方式等方面对上述三种模式具体特征进行了总结。

第四,梳理出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以可持续发展为理念、以社区发展为核心、以“资源—市场—产品”为途径的“金三角”式协作机制框架,指出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在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上的差异,以及产业道路抉择和投资开发形式的不同,除政府和社区居民外,各类投资者和开发者以及其他参与主体(如旅游者、媒体)也会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认为由于各利益相关体以不同的利益视角关注和参与社区发展,因此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和社区协作机制必须关注利益主体及其间的利益关系;通过资源禀赋与协作、产业选择与协作、演进过程与协作、参与层次与协作以及回报方式与协作五组利益关系的识别,构建了由

理论层、原则层、理念与目标层、机制层共同构成的，以政府框架下市场机制为主体，以回报方式为主要内容的西南少数民族社区发展的协作机制。

本项研究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为研究对象，为全国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多样性及其社区协作发展提供了参考；以少数民族种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传承人为参照探讨文化多样性问题，开拓了文化多样性研究的思路；通过自然保护区及其基尼系数来探讨生物多样性问题，实现了生物多样性寻证的创新性和可操作性；在研究方法上，结合问卷调查和典型地区田野调研，识别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不同利益主体的资源认知差异及利益关注分歧，断定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目前尚无成熟、高效、合理的开发收益分配机制，充分证明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在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保护上的使命性和紧迫性；在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方面，分别提出了基于参与和生态博物馆的自然协作保护模式、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综合模式；在以社区协作为基础促进多样性保护方面，提出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社区共管、社区共赢和社区共生三种模式，并对上述模式进行了对比，确定了三种模式的关系与适用性；梳理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以可持续发展为理念，以社区为核心，“资源—市场—产品”为途径的“金三角”式协作机制框架，通过资源禀赋与协作、产业选择与协作、演进过程与协作、参与层次与协作、回报方式与协作五组利益关系的识别，构建了由理论层、原则层、理念与目标层、机制层共同构成的，以政府框架下市场机制为主体，以回报方式为主要内容的西南少数民族社区发展的协作机制。研究具有创新性和实用性。

本书主要撰写者有王昕、母泽亮、续嵩、武光。此外，齐欣、谭璇、陈燕玲、彭莹、何西伟、任春涛、杨秋风、戴卓等参与二手资料汇总与整理、田野调查、问卷设计、数据整理与分析等前期基础性工作。

著者
2015年10月

目 录

第 1 章 研究背景与理论基础	1
一、研究背景	1
(一) 生物多样性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	1
(二) 在现代文明的挤压下文化多样性正在加速消失	2
(三) 社区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四) 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保护已成为全人类的共识	3
二、研究意义	4
(一) 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利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保持优质的生态系统	4
(二)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优秀的文化系统将受益于文化多样性的保护	5
(三) 社区发展有利于推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6
(四) 生物与文化多样性有利于推动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与社区发展 ...	7
(五) 生物与文化多样性保护与社区发展的协同有利于拓宽民族地区发展思路	7
三、研究范围与概念界定	8
(一) 研究范围	8
(二) 概念界定	10
四、研究综述	12
(一) 国外研究综述	13
(二) 生物多样性研究	13
(三) 文化多样性研究	15
(四) 社区研究	16
五、理论基础	17
(一) 主要理论参考	17

(二) 主要理论的借鉴	23
六、研究过程与研究方法	24
(一) 研究过程	24
(二) 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的旁证指标选择	25
(三) 社会态度的调查执行	26
(四) 田野调查的执行	26
 第2章 西南地区文化与生物多样性和社会发展分析	28
一、西南地区的文化多样性	28
(一) 基本情况	28
(二) 文化多样性分析	32
二、西南地区的生物多样性	36
(一) 西南地区的自然保护区现状分析	37
(二) 西南地区的物种多样性分析	40
三、西南五省(市、自治区)的社会发展状态分析	45
(一) 发展差距	45
(二) 发展特征	52
四、社会对少数民族地区生物和文化多样性保护与开发的认知态度	53
(一) 关于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的社会态度调查分析	53
(二) 小结	57
五、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典型社区实地调研	58
(一) 重庆市的典型社区调研	58
(二) 贵州的典型社区调研	62
(三) 云南的典型社区调研	66
(四) 四川的典型社区调研	68
(五) 西藏的典型社区调研	71
六、基于少数民族地区典型社区调查的分析	72
(一) 多样性资源价值分析	72
(二) 不同群体对多样性资源的认识分析	74
(三) 相关利益者的参与意识分析	76
(四) 权利分配情况分析	76
(五) 对当地多样性资源保护的贡献评价	80

(六) 小结	83
七、问题总结	84
 第3章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生物与文化多样性保护和社区发展协作的模式	86
一、生物与文化多样性地区的社区利益关系分析	86
(一) 利益体分类	86
(二) 利益关系分析	87
二、区域协作发展的模式	88
(一) 西南地区一体化协作发展模式	88
(二) 建立“城市—少数民族地区”的互助合作发展模式	88
三、以自然保护为主导的社区协作模式	89
(一) 基于参与的模式	89
(二) 基于原真性保护的模式(生态博物馆)	91
(三) 迁建性保护与社区发展协作模式	94
四、以文化保护为主导的社区协作模式	95
(一) 国内外民族旅游开发模式	95
(二) 文化协作保护原则	96
(三) 文化资源保护与社区发展的综合协作模式	97
(四) 文化遗产保护与社区开发的专项协作模式	98
(五) 个体性文化资源保护与社区开发协作模式	101
(六) 文化资源库模式	102
五、社区主导的协作发展模式	103
(一) 社区共管模式	103
(二) 社区共赢模式	108
(三) 社区共生模式	112
(四) 模式总结	116
 第4章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生物与文化多样性保护与社区发展协作机制	119
一、协作机制理论体系与架构	119
(一) 协作机制内涵	119
(二) 机制构建的主要思路	120
(三) 利益相关者	120

(四) 机制体系	121
(五) 机制原则	123
二、基于利益关系的协作机制	124
(一) 相关利益者的动机与需求分析	124
(二) 利益关系与运行	125
三、基于产业选择与参与阶梯的西南少数民族社区发展协作机制	130
(一) 协作机制设计	130
(二) 配套政策体系	131
四、政策保障机制	133
(一) 总体政策体系架构	133
(二) 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政策建议	134
(三) 市场基础的生态补偿政策建议	134
五、人才保障机制	134
参考文献	136
附件	140

第 1 章 研究背景与理论基础

一、研究背景

(一) 生物多样性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下属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公布研究报告(2010)表明,自1970年以来,全球野生动物数量已减少31%,活珊瑚减少38%,各种红树科植物和海草减少19%;这份报告还发现,濒危物种数量正快速增加,21%的已知哺乳动物、30%的两栖动物、12%的鸟类和70%的植物都面临消失威胁;现在物种消失率是自然死亡率的1000倍。生物多样性逐渐丧失的直接原因表现为生存环境的破坏、外来物种的入侵、生物资源的开发行为过度、生态环境污染,以及全球气候的变化、全球工业化特征日益严重(包括农业、林业等产业的工业化)。导致这些行为产生的根源在于全球人口数量的剧增,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消耗过度增长,传统的农业、林业和渔业的生存空间严重压缩,经济系统和政策绩效未能评估其对环境和生物资源的破坏,在以上领域的开发和发展过程中,专业性知识的介入程度不够、专门的法律和制度缺失或不合理。总之,人类活动是造成生物多样性以空前速度丧失的根源。

20世纪80年代,国际社会和组织开始意识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制定了一系列国际性公约。1990年,生物多样性专家把我国生物多样性排在12个全球最丰富国家的第8位。在北半球国家中,我国是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我国曾为拯救濒危野生动物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60多种濒危珍稀野生动物人工繁殖成功。1992年,我国成为世界上首先批准《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六个国家之一,并成立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委员会,制定了我国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为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奠定了良好基础。环保部副部长李干杰指出,截至2012年底,我国共建立2669个自然保护区,占国土面积的14.9%,这个比例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长期以来,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性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加强物种保护、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保护法规的建设,陆续启动了系列的保护工程,有效地推进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二）在现代文明的挤压下文化多样性正在加速消失

生物多样性需要良好的生态平衡状态，文化多样性也需要维持好文化生态平衡。全球人类目前都面临世界文化多样性殇失的危机，而这种危机被重视的程度远远落后于生物多样性危机引起人们关注的程度，因为它是一种隐形的机制，难于眼见。全球化作为一种涵盖极广的力量，其速度和密度近年来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经济和市场的全球化，必然带来的是文化传播的全球化。各种文化得到空前的交流和融合的同时，全球化的力量也正在同化世界各地的本土文化。特别是语言灭亡的速度急剧加快。语言的消亡使原来以这种语言为载体的文化也必然随之丧失。那些在特殊具体环境中生活的少数民族的求生技能、知识体系，本就是其他群体的继续生存的另一种可能选择。这些技巧一旦伴随着语言的灭亡而消失，人类在多变的环境下将别无选择。但是，许多少数族群在“现代文明”改造中，不得不放弃本族语言和本土文化。我国存在着文化相对的两重性。一方面是面对全球，在现代西方文化输入的强大冲击下，以汉族传统文化艺术为代表的中华民族本土文化相对处于被动守势的弱势地位；另一方面，在国内传统的文化领域中，汉族的主流文化冲击下，周边少数民族的文化艺术一直处于边缘的弱势地位。文化多样性的现状令人担忧，危机重重。

为了保护文化多样性，国际组织缔结了大量的国际公约，如 1966 年的《国际文化合作宣言》、1972 年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89 年的《关于保护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建议》、2001 年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03 年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5 年 10 月 20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33 届大会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这是国际社会捍卫文化多样性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该公约主要规定了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意义、公约的目标及指导原则、公约的适用范围、相关定义、缔约方的权利和义务、公约与其他协定的关系、公约管理机构、争端解决等内容。当前，我国保护文化多样性工作在大范围、全方位展开，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在保护对象、保护方式与途径的选择以及在保护过程中的人文关怀等方面问题较多。保护实践工作亟待科学的方法与理性的思考。

（三）社区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工业革命后，针对工业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欧洲工业国家在社区里开展了一系列社会工作。改革了原有的社会福利和救济制度，更多地注重调动社区居民的积极性，增强了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福利的主动精神。20 世纪初，“睦邻运动”出现在英国、

法国和美国等国,充分利用社区的人力、物力资源,并不断培养社区居民的自治精神和互助精神,其宗旨是动员社区居民参与改造社区生活条件的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政府为了适应战时的需要,将“社区组织运动”在全国普遍开展,其目的是改进社区工作,开展战时服务。社区工作的不断发展,引起了社会学家的关注与研究。1915年,美国社会学家 F. 法林顿首先提出了社区发展的概念。1939年,美国社会学家 I. T. 桑德斯和波尔斯在其合著《农村社区组织》中,较为详细地论述了社区发展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都面临着贫穷、疾病、失业、经济发展缓慢等一系列问题,非洲、亚洲、中南美洲的发展中国家更为严重。仅仅依赖政府力量解决这些问题是远远不够的。运用社区组织方法,合理利用民间资源,发挥社区自助力量的构想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390D 号议案于 1951 年经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通过,建立社区福利中心,推动全球经济、社会的发展被列入计划。“社区福利中心计划”认定不久就被改为“社区发展计划”。联合国于 1954 年将社区组织与发展小组改组,建立了联合国社会事务局社区发展组,并且将社区发展运动积极推广到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得到了其中一些国家和地区政府部门的重视。

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政府虽然没有参与联合国制订的社区发展计划,但实际上也开展了一些类似社区发展的工作。政府曾有计划、有目的地依靠群众力量,将恢复和发展生产,改善社区环境条件,提高群众生活水平等一系列的工作在农村和城市进行开展,并建立了自上而下的群众自治的组织体系、卫生保健制度、社会福利制度以及文化娱乐设施等。1985 年 5 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制订了“星火计划”,即推动农村进入现代化的技术开发计划。至 1987 年底,“星火计划”完成各类项目 2800 多个,增加产值 73.9 亿元,促进了农村社区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这一计划得到了联合国有关组织的高度评价,认为这种模式可能引导世界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传统社区经济向现代化社区经济的成功转化。

(四) 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保护已成为全人类的共识

目前,主流文化在一些不适合的发展策略和全球化进程的影响下加剧了对地方传统文化的冲击,很多地方传统文化在这种冲击下消失,文化多样性也迅速减少。积累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民间传统知识正在流失,对生物多样性利用、管理和保护的傳統方法逐渐减少,使农、林、牧、渔业的资源利用管理模式变得单一化,这种单一化发展进程一方面加剧了当地社区对外部的依赖性,也对当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稳定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在一些具有特殊自然环境条件、丰富的生物资源和传统文化的聚居着少数民族的边远贫困山区,自然生境和生物多样性随着当地改变的传统文化、流

失的传统知识而被破坏和减少；相反，传统知识文化随着自然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及减少，丢失进一步加剧，而这种文化遗产和民族文化特征的破坏和丧失常常是不可逆转的。在传统的生态学理论中，人常被看做是自然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外部干扰因素。而事实证明，生物多样性虽然受人和人类文化的干扰和影响，但也使新的结构和功能进入了生物多样性，使“文化特性”表现在生物多样性中。生物多样性中不仅存在自然属性，社会和文化属性的特征也很明显。

1988年，首届民族生物学国际大会在巴西贝伦召开，会议发布了《贝伦宣言》，宣言提出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之间不可剥离的关系，倡议给予二者同样的保护。这是国际性宣言中首次提出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二者的统一性。1996年10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举办了“濒危的语言、知识和环境”研讨会，这是关于该话题的首次国际性跨学科合作，研讨会强调保护“生物—文化”圈的紧迫性，并为保护和推进生物—文化多样性的研究、培训和实践达成一个有共识的框架。研讨会推进了将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联系起来的意识。这是学界和实践者们将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联系起来的最初尝试，并为后来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了基本的理念和切入点。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地球语言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共同出版了科普性教材《分享一个多元的世界：全球语言、文化和生物多样性》，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推出“生物—文化多样性”一词，标志着这一概念成为全球共识，并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球普及的通讯和行动准则。

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我国各族人民不断地认识自然，不断适应并调整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在与自然界的相互依存和协调发展中，使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得到了创造和发展。这种生物多样性是在特定的社会组织结构和地理环境下，通过相关的生产与文化实践活动，不断地作用于自然环境中而形成的。

二、研究意义

（一）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利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保持优质的生态系统

生物多样性不仅是全球生命存在的基础，也是现代人类社会生活的根基、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意义在于保存现有生物，并通过人类加工挖掘提升其生物多样性的内在价值。

生物本身能够为我们提供诸如食物、纤维、建设材料等生活和生产原料。此外，生物多样性某些实物还具有欣赏价值，其美学价值能美化我们的生活，增添生活的情调。如果大千世界里没有形形色色的植物、万千神态的动物，人类的的生活和生活环境就会变得简单和索然寡味了。

无论任何地区、任何生态单元,生物都是其核心组成成分。在生态系统中,生物之间都具有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生物类别、个体之间共同维护着生态系统的和谐生存状态,让生态系统发挥其功能和作用。野生物种的减少将影响到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生态平衡就会遭到破坏,这又直接影响到我们人类的生存,甚至改变我们的生存空间和生活形态。

以具体的药用生物为例,全球发展中国家人口的80%依赖于自然界生物加工的传统药物,以保证他们基本的健康,即使是西药中,也有40%的药物含量是通过原始生物加工而成的。据近期的调查表明,中医使用的植物药材达1万种以上。一旦这些生物大量消失,肯定危及我们的生存环境、改变我们某些生存方式,甚至改变我们的生活轨迹。因此,对于任何目前我们清楚的、尚不清楚的野生生物,都需要进行保护。

我国西南地区是我国生物多样性表现最明显的地区之一,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生物多样性特征表现更加明显,也因此孕育了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丰富的民族文化,使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化根深叶茂、不断繁衍。所以,通过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有利于促进和深化西南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促进民族地区的生态系统优化,建立更加协同的发展机制。

(二)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优秀的文化系统将受益于文化多样性的保护

文化多样性作为人类的共同遗产之一,是人类文化发展、繁荣的基础。对人类来说,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同生物多样性一样。西方有些学者认为,人类这一物种继续生存下去的关键因素可能是文化多样性。因此,当代世界的客观现实要求我们保护文化多样性,保护各民族的文化。

文化多样性的存在是人类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的重要前提。任何一种可能的文化,都有自身的长处,同时也有其缺陷。一种文化就只有通过学习其他文化的优秀之处以取长补短,来迎接挑战,积极地适应环境,才能获得生存的机会和可能性。而就人类文化的整体而言,如果离开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互补整合,就有可能危及人类文化整体的持续存在。

文化多样性的存在为人类文化实现类似于生物学意义的“杂交优势”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不仅仅是共生共存,还能够相互补充、相互完善;另一方面,文化多样性的存在还为特定文化的选择提供了多种可能性,而对新的可能性的尝试和探索,恰恰是文化无穷的创造性与活力的体现。

民族平等和保障人权的基础是文化多样性。民族无论人口多少,无论处于社会何种发展阶段都一律平等。各民族应该相互尊重并相互理解和认同各自的文化。文化权利作

为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具有不可分割的和相互依存的关系。选择自己的语言文字，并用自己的母语来创作和传播自己的作品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是我们每个人的权利。要真正实现民族平等，只有以充分保护各民族的文化为前提，每个人均能自由使用本民族文化的权利才有可能实现。

文化遗产可以造福于子孙后代，是一个民族或国家具有重要价值的资源。多姿多彩的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每一个民族独有的风俗、礼仪、饮食、居住、服饰等，构成了独具魅力的人文风景。事实表明，社会和经济要发展，保护和开发文化遗产资源是十分重要的。一是各民族的传统文化能使我们了解历史，并通过历史教育后人以凝聚鼓舞国民之心，陶冶其情操并净化灵魂。二是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也是传统文化的一个特征，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保护、开发和利用文化遗产资源，文化遗产资源带动了旅游业的发展并占据了整个国家经济的相当高的比重，旅游业及其相关产业的收入成为一些国家主要的财政收入。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上较落后，应该把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和开发放在战略性的高度，建立具有活力的、具有本国和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产业。

（三）社区发展有利于推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作为经济和社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程，近年来，社区建设运动在我国城乡都进行了广泛的开展，集中体现了有中国特色社区发展的要求。使思想意识和心理情感上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成为社区居民的共有特征，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与吸引力。发展社区文化作为社区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能够使广大群众的精神生活需要得到满足。而社区文化的群众性、思想性、娱乐性和知识性正是比专业文化生活更具特色的一方面。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不仅在社区居民的自我创作、自我表演、自我娱乐和自我教育中得以满足，而且在社区共同参与的过程中社区居民之间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得到加强，社区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也得到了增强。

社区作为社会单元的基础层面，我们要抓住社区发展这个关键点，把社区作为载体，群众作为主体，精神文明建设才能真正落到实处，只有这样才能在建设中不断提高社区居民的文明素质，也使得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及文明程度再上一个台阶。劳动效率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也发展了，人们有越来越多的休闲时间，社区慢慢变成居民一周 40 小时以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休闲场所。社区发展可以采用多种群众喜欢的形式，把科学文化知识传授给他们，并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这样可以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丰富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提高科学文化素养，增强法制观念和现代意识，培养新的社会习俗风尚。